

家庭結構變化對台灣所得分配 及經濟福利分配的影響

林金源*

淡江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本文分析近年來台灣家庭結構的快速變化，如何影響所得及經濟福利的分配。我們發現就業者愈多的家庭其所得分配愈平均。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就業者的家庭，其所得不均度一直低於全體不均度且呈長期遞減趨勢。單一及無就業者家庭之間的不均度則從 1980 年起持續上升。顯然整體不均度的上升除了肇因於各組家庭的「組間貢獻」之外，主要來自單一及無就業者家庭的「組內貢獻」。

家庭結構變化和婦女就業率的提升，使單一及無就業者家庭漸成低學歷、高年紀的老年家庭，他們居住於鄉村和從事農業的比率也較高。因此當其他家庭的所得不均度都下降時，他們竟反向而行並帶動全體不均度往上升。

另外由於消費單位較少，貧戶及老年家庭享有的經濟福利常比其所得顯示的還高。富戶和壯年家庭的的情況正好相反。近來家庭間經濟福利的不均度雖亦愈來愈大，但却遠小於所得不均度。

關鍵詞：所得分配、經濟福利分配、家庭結構、不均度分解、
等成人數

* 作者感謝國科會研究計劃 NSC85-2415-H-032-002 之補助及兩位匿名評審的指正。
收稿日期：八十六年五月七日；接受刊登日期：八十六年九月五日

壹、前言

家庭結構變化對台灣所得分配的影響，已經引起廣泛的討論。針對 1980 年之後所得分配持續惡化的原因，朱雲鵬（1991）、饒志堅等（1991）、Deaton & Paxson（1993）和 Chu & Jiang（1997）等文都認為與人口因素以及家庭結構有關。Lin（1994）及林金源（1995）引伸傳統人力資本理論，指出傳統家庭解體和高等教育擴張，導致家庭間人力資本分配愈趨不均的現象，便是解釋所得不均度持續上升的主因。本文是前述二者的後續研究，希望進一步分析近年來台灣家庭結構的快速變化，如何影響家庭之間所得以及經濟福利的分配。

具體來說，本研究將探討 Lin（1994）文中提及的兩個特殊有趣的現象：第一，如果把所有家庭按照就業者的人數分組，擁有兩個以上就業者的家庭（約佔全體家庭的半數），其所得不均度一直低於全體家庭的所得不均度，而且也看不出明顯長期遞增的趨勢。（其實從 1985 年起是遞減的）。反之，其他只有單一就業者（含無就業者）家庭的所得不均度，則顯現長期遞增的趨勢。全體家庭所得不均度上升的原因，一大部份是來自第二類家庭所造成的影響。尤有甚者，這種影響力正與日俱增。隨著社會結構的快速轉變，單親家庭、一人家庭、核心（老人）家庭的數量也越來越多。因此，對這些家庭的了解，自然成為探究全體家庭所得不均度上升原因的重要部份，這是本文的第一個主題。

第二，所得分配和經濟福利（economic well-being）的分配是兩個類似但不相同的概念。前者著重於所得的來源（source of income），探討家庭間生產條件（如勞動供給）的差異，如何造成貧富間所得的差距；後者則著重於所得的消費（use of income）可以帶來效用，探討家庭間所享受的經濟福利有何差別。我們延用慣例稱前者為所得分配，它顯然與家庭的生產條件有關；後者我們稱為經濟福利的分配，它不僅受生產條件的影響，也取決於消費者的人數與組合。

一個社會中如果多數家庭的組織型態相當接近，（如歐美社會以核心家

庭為主，或如台灣早期社會以傳統家庭為主），則所得分配與經濟福利分配應該是指同一件事。反之，台灣近二十年來正歷經人口及家庭形態的轉換期，傳統家庭解體、人口老化的趨勢方興未艾，因此各類家庭間生產者與消費者穩定的對應關係起了變化。¹ 這就造成了所得分配與經濟福利分配各說各話的情況。台灣地區的所得不均度，從 1980 年起持續上升，所得分配惡化是否意味著家庭間經濟福利分配愈趨不均？兩者嚴重的程度究竟有何不同？其次，人口老化的現象使老年家庭的數量愈來愈多。社會上普遍注意到老年家庭的相對所得一直下降，他們究竟是不是經濟上的弱者？反之，壯年家庭由於其家長正處生命循環中的高所得時期，他們是否就享有最高的經濟福利？本文第二個主題，旨在探討各類家庭經濟福利的水準及分配之長期變化，再拿它們和家庭所得的水準及分配作比較。這項分析，將可提供政府作為擬定社會福利政策的參考。

本文共分六節。除本節前言之外，第二節是文獻回顧與背景介紹，第三節說明資料來源及研究方法。第四、第五節分別討論家庭結構變化，對所得分配與經濟福利分配的影響。第六節是結論。

貳、文獻回顧與背景介紹

家庭成員合力生產出家庭的總所得，進而共同分享這份所得帶來的效用。各成員的生產、消費行為以及所能享受的經濟福利，息息相關不可分割。因此，包括 S. Kuznets 等多位經濟學家都指出，家庭才是研究所得分配時，較完整的觀察單位。研究所得分配的文獻中，根據觀察的對象為個人或家庭大致可分為兩類。近年來台灣地區所得分配惡化的情形，指的便是家庭間而非個人間的所得分配。

本文的主題雖然在探討近年來台灣所得分配惡化的情形，但是 Kuznets (1980) 對 60 與 70 年代台灣所得平均化的解釋卻提供我們重要的啟示，值得介紹。許多文獻把這個階段台灣所得平均化歸功於土改成功、農家收入增加、

1 詳見林金源 (1995) 第四節。

教育普及、薪資所得持續增加等因素。Kuznets 卻獨排眾議，認為如果把人口因素加入考慮後，所得不均度持續下降的情況根本不存在。他指出窮戶人口數相對上升，富戶人口數相對下降，乃是造成所得不均度在這個階段持續下降的主因。換言之，所得不均度在 60、70 年代之所以下降，乃是因為富戶人口在這個階段減少得比貧戶快。可惜的是，Kuznets 也把所得分配中生產面和消費面的兩層涵意混淆在一起。從生產的層面來說，Kuznets 的說法可以解釋成：富戶生產者的數量下降得比貧戶快，窮、富家庭之間生產者的數量愈趨接近，這種生產條件的拉近，促使貧富間的所得差距縮小。另從消費面來說，他的說法應該解釋為：表面看來，貧富間所享的經濟福利的差距縮小了，但由於富戶消費者的數量下降的比貧戶快，因此實質上這些差距並沒有改變。

所得與經濟福利的分辨對 Kuznets 所觀察的階段或許並不重要，但從 1970 年代下半期起，由於傳統家庭的解體，造成二者的差別有了明顯的意義。其原因如下：從 70 年代後期開始，隨著出生率的降低以及傳統家庭的解體，家庭人口遞減成為不可避免的長期趨勢。有趣的是，每戶平均勞動力並沒有因為每戶平均人口數下降而下降。² 雖然人口遞減是所有家庭的共同趨勢，但是在這個轉換的過程中，富有的家庭減少的是非勞動人口，貧窮的家庭流失的既有非勞動人口也有勞動人口。人口和勞動力在家庭間的分配於 60 和 70 年代雖都有愈趨平均的傾向，80 年代起則愈趨不均。尤其，勞動力的分配比人口的分配更不均，而這兩種不均度的差距越來越大。這種差距的擴大，代表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對應關係，在貧富家庭間起了不一樣的變化。這也使得經濟福利與家庭所得之間，出現不同的長期趨勢與分配型態。³

一個家庭的經濟福利一方面取決於該家庭的總所得，另一方面取決於共同消費該所得的人口組合。一個最直覺、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總所得除以家庭人數，當作家庭經濟福利的指標。但是這種作法忽略了消費面的規模經

2 這可能肇因於(1)婦女勞動參與率日漸提高；和(2)每戶孩童數減少，所以成人／孩童的比率日漸提高。

3 請參見 Lin (1994) 及林金源 (1995)。

濟，以及大人、小孩的消費量有所差異的兩項事實。Easterlin *et al.* (1990) 應用 Fuchs (1986) 的觀念，指定每戶裏的第一個成人的權數為 1，其餘的每個成人皆為 0.8；指定每戶第一個小孩的權數為 0.4，其餘每個小孩的權數為 0.3。再把這些權數加總，便得到這個家庭的消費等成人數 (adult equivalents)。最後，把家庭總所得除以消費等成人數，便得到代表該家庭經濟福利的 IAE (income per adult equivalent)。在美國的實證研究當中，Easterlin *et al.* (1990) 指出不論是其水準或是分配，IAE 和家庭總所得表現出來的都很不一樣。另外，嬰兒潮誕生的一代雖然家庭所得偏低，(肇因於勞動市場的同儕排擠效果)，但他們藉由婚育行為、家庭型態上的改變，使他們享受到的經濟福利毫不低於其他家庭。

有關所得分配和經濟福利分配的差異，在國內還沒引起應有的注意。目前為止，似乎只有朱雲鵬 (1989) 以及王金利 (1988) 提及經濟福利的概念。朱雲鵬 (1989) 雖然運用了 IAE 的觀念，但是該文的目地在於從生產面進行所得分配惡化原因之探討，而且朱雲鵬對 IAE 的定義也與 Easterlin *et al.* (1990) 不同。⁴ 王金利 (1988) 從消費函數出發，運用迴歸方程式探討等值規模 (equivalence scale) 的測定方法，並且提出一個與本研究有相關的結論，亦即：應用等成年數時，因測定方法的不同，差異可能很大。所得分配與經濟福利分配之間的關係，以及家庭結構變化如何影響上述二者，都不是前述兩篇文章的主題。

本研究關心的另一項主題是：家庭結構變化如何影響所得分配。台灣地區家庭間的所得不均度，雖然從 1980 年起持續上升，但是個人所得分配卻從 1976 年起愈趨平均。〔參見饒志堅等 (1991) 及 Lin (1994)〕。特別是家庭間的薪資所得分配，從 1984 年起竟然比個人間的薪資所得分配更為不均。薪資所得扮演的角色，在 60 年代本是促使家庭總所得更平均的因子，1976 年之後卻變成促使家庭總所得不平均的根源。〔參見朱雲鵬 (1989) 及曹添旺 (1996)〕。因此，家庭薪資所得不均化的原因，應該是解釋家庭總所得不均化

4 朱雲鵬 (1989) 採用行政院主計處對等成年男人的定義，此定義只考慮大人、小孩間消費量不同的事實，並未考慮消費層面具有規模經濟的現象。

的關鍵。

林金源（1995）指出：雖然薪資所得在個人間的分配愈趨平均，但是薪資收入者的數量或質量，在家庭間的分配卻愈來愈不均。傳統家庭解體及高等教育擴張是促成上述現象的主因。如果把家庭的人力資本總量，定義為每個薪資收入者人力資本存量的和，則家庭間人力資本總量不均度的上升，就可以解釋儘管個別薪資收入者間的薪資所得分配略趨平均，家庭間薪資所得分配卻愈趨不均。換句話說，該文引伸了傳統人力資本理論，用以解釋家庭所得分配的變化，並且根據這個理論發展出一種方法，分解家庭成員的教育、年齡等變數對所得不均度的影響。再者，家庭結構變化也解釋了何以薪資所得在不同的時期，對總所得分配扮演不同的角色。總而言之，人口因素以及社會價值觀的演變，導引家庭結構變化，進而影響所得分配，這是該文的主要觀點。本文接續該文的觀點與結果，但是嘗試補充下列兩項內容：第一，該文只是概括性的點出家庭結構變化如何影響所得分配，本文則把探討的對象直指單一就業者（含無就業者）的家庭，認為他們是造成近年來所得分配惡化的主角，進而分析其特性。第二，該文由於篇幅所限，並未探討經濟福利分配的問題，本文除了補此不足之外，更可透過此一個角度，對家庭結構變化所造成的效果獲取通盤的瞭解。

由於家庭結構變化對所得分配，（連帶也對經濟福利分配）造成如前所述的重大的影響，本文因此決定對這個主題作進一步的探討。（具體的研究內容已如前言所述）。其實不止是開發中國家（如台灣）存在此一問題，西方的文獻〔如 Santi（1988）、Easterlin *et al.*（1990）等〕也已注意到，隨著社會結構、婚姻觀念的快速轉變，單親家庭、一人家庭、核心（老人）家庭的數量也越來越多。這種家庭型態的改變，無疑也對已開發國家的家庭所得和經濟福利的分配，造成重大的影響。

參、資料來源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的資料，來自歷年行政院主計處的個人所得分配調查報告。該調查雖然始自 1964 年，但是 1976 年之前的原始資料磁帶無法取得。因此

本文的研究期間是從 1976 年到 1995 年。爲了節省繁複的計算過程，大部份的分析對象僅限於 1976、1980、1985、1990、和 1995 等五個年份。這種省略對分析的結果並無不良影響。

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除了一般統計上的特性分析 (descriptive analysis) 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不同族群間不均度的因素分解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by subgroups)。我們先把全體家庭按照某一個特性 (如家長年紀、所得收入者的人數等)，分爲互斥且互斥 (mutually exclusive and exhaustive) 的幾個組。再把全體家庭的所得不均度，分解爲組間不均度和組內不均度的和。組間不均度對總體不均度的比，即爲該特性對總體不均度的影響。〔請參見 Shorrocks (1980、1984)〕。因此，我們便可以把所得分配和經濟福利分配的不均度，分解成組內貢獻和組間貢獻的和，據以比較家庭結構變化如何對二者造成影響。另外，爲方便上述的因素分解，我們採用的不均度指標是 Theil 指數。雖然不同的不均度指標所隱含的權數都不相同，但在本研究中這並不是問題。

假設我們有 N 個家庭，各自擁有所得 Y_i ，($i=1, 2, 3, \dots, N$)，平均所得爲 μ ，則全體家庭所得不均度 Theil 指標 $T(Y; N)$ 可定義爲：

$$T(Y; N) = \frac{1}{N} \sum_i \log\left(\frac{\mu}{Y_i}\right) \quad (1)$$

如果上述家庭分屬於 G 個組，各組的平均所得爲 μ_g ，各組的家庭數爲 N_g ，其中 $g=1, 2, 3, \dots, G$ ，則全體家庭不均度 Theil 指標 $T(Y; N)$ 可分解爲組內不均度 (within-group inequality, W) 和組間不均度 (between-groups inequality, B) 之和。其中

$$W = \frac{1}{N} \sum_g \sum_i \log\left(\frac{\mu_g}{Y_i}\right) \quad (2)$$

$$B = \frac{1}{N} \sum_g N_g \log\left(\frac{\mu}{\mu_g}\right) \quad (3)$$

其實組間不均度 B 與全體不均度 $T(Y; N)$ 的概念完全相同，只是假設每組組內的家庭所得都等於該組平均數，在這種情形下計算出的不均度。換言之，

B 所衡量的是：剷除所有組內不均的狀況，如果所體的不均都來自組跟組之間的差異時的不均度。因此 $T(Y; N)$ 便可表為一個組間不均度與 G 個組內不均度的總和。而組間不均度對全體不均度的百分比， $B/\text{Theil}(Y; N)$ 即為該分組標準對全體不均度的解釋能力。

此一不均度分解的方法最大的好處是簡明易懂，與我們的直覺相吻合。它的缺陷則有下述三點：第一、此法分解出某因素對不均度的貢獻，乃是該因素的「毛效果」(gross effect)，而不是「淨效果」(net effect)；第二、當全體作兩層的交叉分類時，甲、乙兩因素對不均度的聯合貢獻，並不等於甲、乙兩因素各自的貢獻的和，其差距就是兩因素的互動效果 (interaction effect)，[參見 Cowell (1988)]；第三、如果為了理論上的需要，全體必須作多層的交叉分類時，計算過程將會相當繁複。

肆、家庭結構變化對所得分配的影響

多數家庭都含有一個以上的就業者，⁵ 這些就業者往往從事不同的行、職業，並且分屬於不同的年齡層和教育水平，家庭總所得就是這些就業者集體努力的成果。而所得來源的多樣化，也使得家庭間的所得分配比個人間所得分配來得平均。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台灣的所得不均度從 1980 年起持續上升。如果把所有的家庭按照就業者的人數分組，則就業者愈多的家庭其所得分配愈平均，[請參見圖 1-1]，這個結果與上述家庭組織使所得平均化的推論相符。

另外，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就業者的家庭，其所得不均度一直低於全體的不均度，而且它的長期趨勢是遞減而不是遞增。但是只有單一就業者的家庭之間，其所得不均度則從 1980 年起持續上升，其趨勢與全體家庭完全吻合。(不過這組家庭所得不均度的水準也一直低於全體不均度的水準)。依靠財產所得及移轉所得生活而毫無就業者的家庭，其所得不均度一直高於全體

5 凡是擁有薪資所得或產業主所得者即為就業者。

的不均度，⁶ 而且它在 80 年代的長期趨勢是遞增的。我們可以從圖 1-2 看出，如果扣除單一以及毫無就業者的家庭，則全體家庭所得不均度長期上升的趨勢就消失了。（其實從 1985 年起是持續下降的）。顯然整體家庭所得不均度的上升，除了肇因於各組家庭的「組間貢獻」之外，⁷ 最主要就是來自單一及無就業者家庭這一組的「組內貢獻」。

如果把所有就業者當作觀察的對象，他們之間的所得不均度長期而言是下降的。〔參見饒志堅等（1992）、林金源（1995）、及曹添旺（1996）〕。可見單一就業者家庭中的這些就業者，是全體就業者這個母體中一組很特殊的樣本，絕非是隨機抽取出來的。隨著社會結構、婚姻觀念的快速轉變，單親家庭、一人家庭、核心（老人）家庭的數量也越來越多，本研究第一個要解答的問題就是：擁有單一就業者（含無就業者）的這些家庭，以及這些就業者，究竟具有什麼特色？何以當其他家庭的所得不均度都下降時，他們竟反其道而行，並且抵銷其他家庭的影響，從而帶動全體家庭的不均度往上升？

理論和實證資料都顯示，年齡越高或者教育程度越低者其所得分配越不平均。另外，鄉村地區比都市不均；農業部門比非農業部門不均；女性比男性不均。我們把全體家庭依其就業者人數為 0、1、以及 2+ 分成三組。表 1 比較 1976 和 1995 兩年中，各類家庭家長的年紀、教育年數、從事於農業部門的比率、男性比率、和居住於鄉村地區的比率。

我們粗步的研究發現，無就業者 and 單一就業者家庭中的家長，其年齡和教育程度在 1976 年時和其他家庭比較接近；但到了 1995 年，相對來說，他們變成年紀比較大、教育程度比較低的一群。就年紀來說，人口老化是前兩

6 所得來源多樣化的涵意有兩個層面：第一，就業者越多的家庭，其就業者往往從事不同的行、職業，（並且分屬不同的年齡層和教育水平），他們的所得來源自然較為多樣化；第二，家庭總所得是薪資所得、產業主所得、財產所得及移轉所得之和。把四種功能性所得加總成總所得時，前四者自然會截長補短，因此總所得的不均度必定小於各功能性所得的不均度。無就業者的家庭其所得來源少了薪資所得（不均度為四種功能性所得中最低者）和產業主所得，所得不均度自然較大。值得注意的是，財產所得與財富的累積有關，（而財富的分配遠比所得的分配更不平均），因此財產所得的不均度為四種功能性所得之冠。

7 組間貢獻逐年遞增，直到 1995 年的 31.33%，表示生產者的數量可以解釋約三分之一所得不均度。

圖 1-1 各類家庭所得不均度的長期趨勢：以就業人數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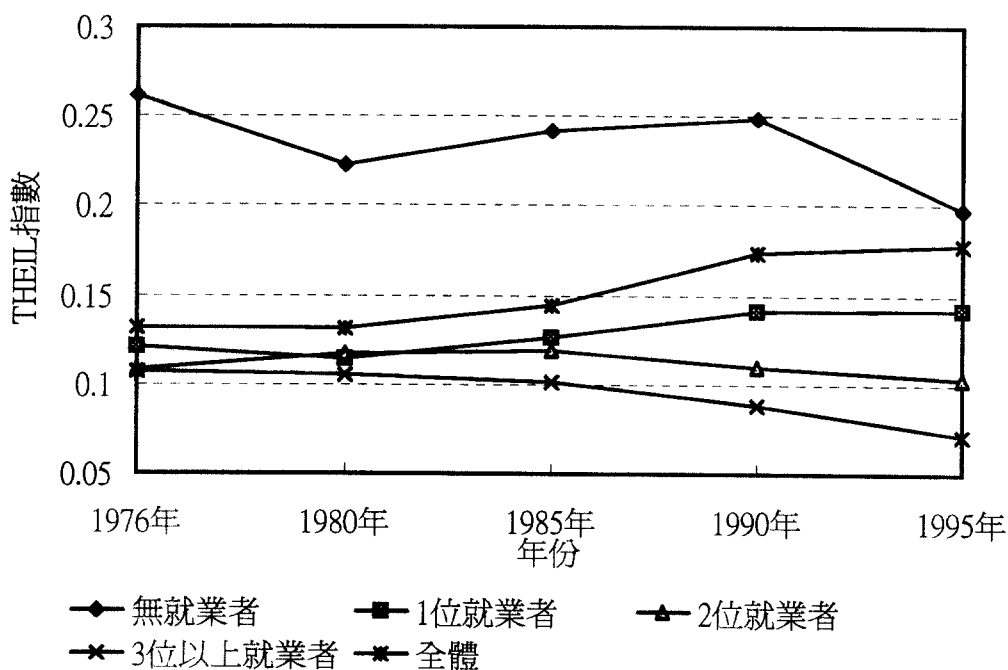


圖 1-2 各類家庭所得不均度的長期趨勢：以就業人數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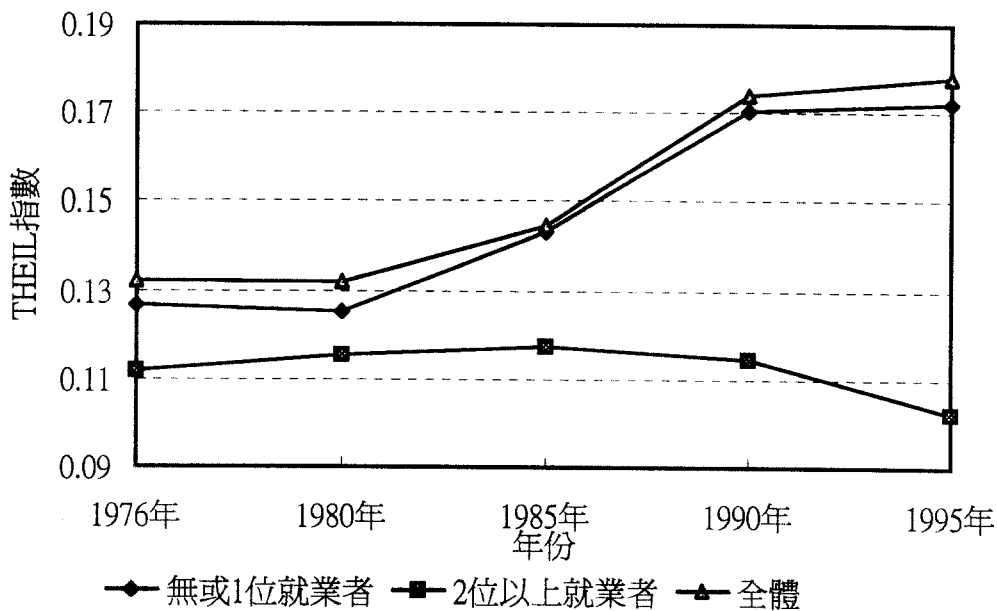


表 1 各類家庭家長的特性之跨期比較：以就業人數分

年度	1976			1995		
就業人數	0	1	2+	0	1	2+
年齡	59.51	40.71	42.96	66.89	44.12	41.73
教育年數	5.67	8.23	7.68	6.08	9.85	10.55
男性比率	58.70%	95.28%	93.69%	66.84%	84.91%	88.86%
鄉村比率	35.51%	31.13%	39.71%	17.15%	14.03%	12.94%
農業比率	2.90%	20.00%	31.00%	1.24%	11.58%	5.84%

組家庭的共同現象，而且就業者人數越少的家庭老化速度越快。這表示無就業者 and 單一就業者家庭中，有越來越多的老年家庭。含有兩個以上就業者的家庭之家長，其年齡不升反降。表示這類家庭中，年輕核心家庭的比率越來越高。值得注意的是：無就業者的家庭，（即沒有薪資所得或產業主所得的家庭），從 1976 年的 1.46% 持續上升至 1995 年的 6.58%。換言之，依靠財產所得或移轉所得生活的家庭越來越多，他們極可能是傳統家庭解體之後的老年家庭。

就教育來說，每組家庭的教育年數都隨著經濟發展的程度而遞增，可是就業者人數越多的家庭增加的幅度越快。單一就業者的家庭在 1976 年本是教育程度最高的，到了 1995 年則被兩個以上就業者的家庭所取代。合理的猜測是：婦女就業率的提升以及傳統家庭的解體，越來越多的雙薪夫婦獨自組成核心家庭，他們的年紀較輕、教育程度較高，是教育擴張（educational expansion）的受惠者。而單一就業者的家庭卻包含了愈來愈多的老年家庭，他們的年紀較大，因此教育程度相對較低。

除了無就業者的家庭之外，男性家長的比率都在遞減。表示社會觀念以及家庭結構的轉變，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女性家長，這種經驗與歐美各國相符。與此潮流相抵觸得的，則是無就業者的家庭。不過，這一類家庭既然沒有就業者，其家長性別對所得的影響，自然毫無意義可言。

各類家庭居住於鄉村地區的比率都在下降，顯然都市化乃是經濟發展過

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儘管該項比率在 1976 年並無明顯的型態，但到了 1995 年則顯現出一個有趣的變化。亦即：就業者人數越多的家庭，都市化程度越高。換言之，所得不均度較低的多就業者家庭，居住在都市的比率最高，這與前述的猜測吻合。最後，從事於農業部門的比率在 1976 年時以多就業者家庭最高，但到了 1995 年則以單一就業者家庭最高，這也有助於解釋何以不同家庭的所得不均度之長期趨勢並不相同。

綜合上述，我們的結論是：在台灣快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傳統家庭逐漸解体，婦女就業率日益提高，越來越多的雙薪夫婦獨自組成核心家庭，他們的年紀較輕、教育程度較高，是政府擴張教育的受益者。反之，當成年子女逐漸離開父母自立門戶之後，老年家庭遂成為單一就業者（含無就業者）這類家庭的主要構成因素。換言之，擁有單一就業者（含無就業者）的這些家庭，漸漸形成低學歷、高年紀的老年家庭的代名詞。另外，相對來說，他們居住於鄉村和從事農業活動的比率也比較高。這似乎解釋了何以當其他家庭的所得不均度都在下降時，他們竟反其道而行，並且抵銷其他家庭的影響，從而帶動全體家庭的所得不均度往上升。⁸

接續以上的分析，我們把多就業者家庭排除在外，針對單一就業者（含無就業者）的這些家庭作不均度的因素分解。我們依序把這些家庭按其家長的年齡、教育、性別、是否從事農業、是否居住鄉村等特性分組，再求取這些因素對家庭所得不均度的貢獻，其結果請參見表 2。

從表 2 我們可以得到下列幾項重要結論：第一，產業效果和城鄉效果在 1990 年之前相當穩定，（分別約為 6%、8% 左右），但在 1995 年則下降了很多。較可能的解釋有兩種：(1) 1995 年屬較特殊的一年，是長期趨勢的一個例外。(2) 在經濟發展的初期，由於經濟結構仍然來不及調整，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存在不同的就業、獲利機會，因此產業與城鄉對所得不均度具有較大的解釋能力。當經濟體系逐漸調整完成，上述就業、獲利機會的差距日益縮小，產業效果和城鄉效果自然也會減小。

8 這個結論與林金源（1995）的分析正可互相呼應。

表 2 家庭特性對單一就業者(含無就業者)家庭所得不均度之貢獻(%)

年度	1976	1980	1985	1990	1995
年齡效果	4.02	5.25	8.11	13.72	14.86
教育效果	8.61	10.18	14.68	15.50	18.15
性別效果	1.02	2.81	3.03	3.83	3.40
產業效果	5.67	6.79	6.00	6.91	1.95
城鄉效果	7.40	8.80	7.19	8.34	3.76
年齡與教育綜合效果	10.83	16.40	23.61	25.57	25.71

第二，年齡、教育、性別、和年齡與教育綜合等各項效果都有長期遞增的趨勢，表示這些因素對單一就業者（含無就業者）家庭所得不均度的解釋能力與日俱增。第三，各單項效果中，每年都以教育效果最為重要，（從 1976 年的 8.61% 上升到 1995 年的 18.15%），表示教育程度是決定所得水準以及所得不均度的首要因子。年齡效果在 1985 年之前並不重要，但從該年起則躍居第二位。第四，年齡與教育的綜合效果（代表人力資本）是把家庭按戶長年齡和教育交叉分類之後，分解得到的結果。⁹ 它們在 1976 年解釋了不均度當中的 10.83%，此一效果持續遞增到 1995 年的 25.71%，可見人力資本對家庭所得水準及其不均度的影響力越來越強。

各單項效果中，每年都以教育效果最為重要，這與我們的直覺相吻合，也映證了傳統的人力資本理論。家長的年齡、教育、性別、和年齡與教育綜合等各項效果具有長期遞增的趨勢，代表我們掌控了解釋不均度的正確方向，也表示傳統家庭解體的效果日漸顯現。（詳見下文）。而人力資本對家庭所得水準及其不均度的影響力越來越強，此與林金源（1995）之推論一致。換言之，家庭內的人力資本對所得不均度之重要性與日俱增的現象，不僅發生在全體家庭之間，也發生在單一就業者（含無就業者）家庭之間。設想一個三代同堂的典型傳統家庭，唯一的就業者是成年的兒子，年老的父母則只有財產所得和移轉所得，在這種社會裏，家長的年紀、教育、性別和該家庭

9 此效果並不等於年齡、教育兩個單項效果的和，這是因為兩變數之間存在交叉效果所致。

的所得並沒有太直接的關聯。反之，在一個核心家庭為主的社會裏，家長的年紀代表該家庭生命循環中的各個階段，自然與家庭所得有強烈的相關。家長的教育程度和性別對家庭所得的影響力也顯然比傳統社會要大。上述各單項效果以及人力資本對所得不均度的解釋能力長期遞增的現象，應該是核心家庭逐漸取代傳統家庭所造成的效果。

伍、家庭結構變化對經濟福利分配的影響

根據第二節的討論，我們用 IAE (income per adult equivalent) 代表一個家庭的經濟福利。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本文發現近年來經濟福利的分配雖亦愈趨不均，但顯然比所得分配的情況好很多。圖 2 與圖 1 類似，列有全體家庭和各組家庭 IAE 分配的長期趨勢。(分組的標準是根據家庭中的就業者人數)。與圖 1 比較，我們可從圖 2 看出幾個有趣的現象：(1)全體家庭 IAE 不均度的長期趨勢也是上升的，但不像所得不均度那樣明顯；(2)雖然單一就業者和擁有三個以上就業者的家庭其 IAE 趨勢與所得分配相似，但是擁有兩個就業者的家庭，其經濟福利的不均度竟然大於全體家庭以及單一就業者的家庭。這和圖 1 當中家庭所得分配顯示出來的情形有異。可見影響經濟福利分配和所得分配的因素很不一樣。就所得分配來說，就業者越多的家庭其不均度越低，這是因為所得來源多樣化可以截長補短。就經濟福利分配來說，兩個就業者家庭的不均度大於單一就業者家庭的不均度，表示前類家庭的消費單位（等成人數 adult equivalent）差異極大，掩蓋了該組家庭所得比較平均的事實。

表 3 把所有家庭按所得分為五組，並分別計算其相對所得和相對經濟福利（以相對 IAE 來表示）。相對所得是把該組的平均所得除以全體平均所得而來。（同法可求得相對 IAE）。相對所得大於 100 的家庭表示其所得高於全體家庭的平均所得，是富者。反之，相對所得小於 100 的家庭表示其所得低於全體家庭的平均所得，是貧者。最窮的 20% 家庭 (Q1 組) 其相對所得從 1976 年的 45.14 一路下滑到 1995 年的 36.26。最富的 20% 家庭 (Q5 組) 其相對所得在 70 年代後期稍有下降，從 1980 年之後則一路爬升到 195.49。大島指數

(即 Q5 與 Q1 的差距 $Q5/Q1$) 所顯示的驅勢與所得不均度非常類似，亦即 1980 年之前下降，之後一路上揚。

圖 2 各類家庭經濟福利不均度的長期趨勢：以就業人數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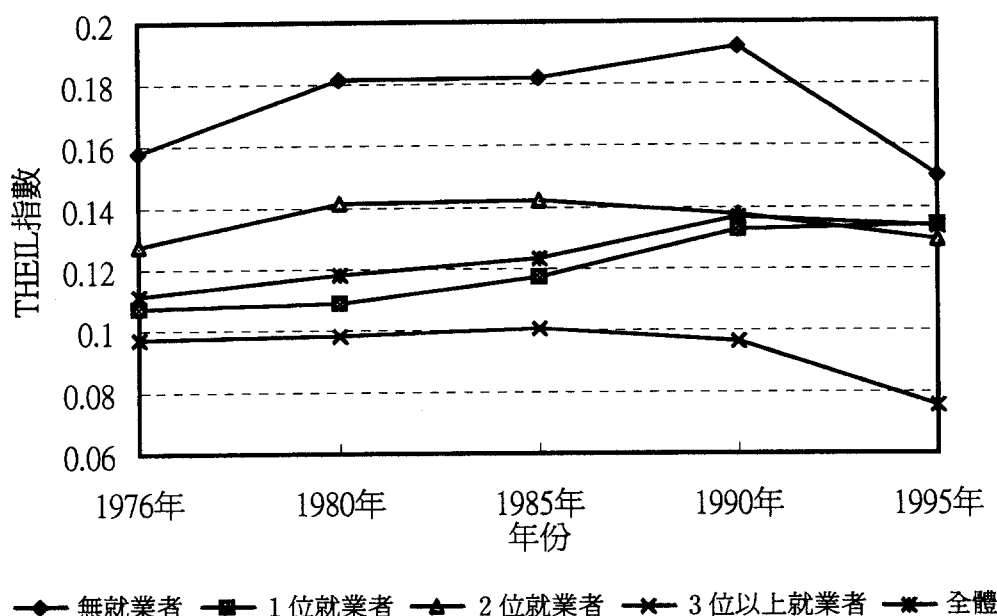


表 3 五分位家庭的相對所得和(相對 IAE)

年度	Q1(貧)	Q2	Q3	Q4	Q5(富)	Q5/Q1
1976	45.14 (64.07)	68.10 (76.85)	87.27 (91.51)	113.34 (111.33)	186.15 (156.23)	4.12 (2.44)
1980	44.37 (63.14)	69.42 (76.86)	88.50 (92.82)	113.91 (109.38)	183.82 (157.82)	4.14 (2.50)
1985	42.13 (62.30)	68.16 (76.50)	87.75 (90.05)	114.37 (109.10)	187.59 (162.04)	4.45 (2.60)
1990	36.95 (57.99)	65.86 (75.69)	87.48 (88.80)	116.17 (111.05)	193.54 (166.47)	5.24 (2.87)
1995	36.26 (60.29)	64.45 (74.17)	86.74 (86.87)	117.08 (109.70)	195.49 (168.98)	5.39 (2.80)

如果從經濟福利的角度觀察，貧富的差距顯然小得多，（相對 IAE 的大島指數遠比相對所得要小），而且長期來看這個差距並沒有擴大很多。有趣的是，較貧窮的 60% 家庭（Q1、Q2、Q3 三組）其相對經濟福利均比相對所得高；反之，較富有的 40% 家庭（Q4、Q5 二組）其相對經濟福利均比相對所得低。這表示富戶所得雖高但所需供養的消費單位也較多，貧戶所得雖低但所需供養的消費單位也較少，因此他們所能享受的經濟福利的差距，遠比家庭所得表現出來的差距要小。

表 4 把所有家庭按家長年齡分為五組，再分別計算其相對所得和相對經濟福利（以相對 IAE 表示）。歷年來 50 歲組的家庭所得總是最高，其次為 40 歲組。年輕家庭及老年家庭所得最低，是倒 U 型分配的兩端尾巴。這印證了傳統人力資本理論（human capital theory）的推論。其次，長期來看，各組家庭的相對所得都略有增加，唯獨老年家庭（60 歲以上）一直遞減。他們的所得在 1976 年仍比年輕家庭（30 歲以下）為高，到了 1995 年就遠遠落後。（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有二：其一，因為這類家庭原本含有一些較高收入的成年子女同住，但是隨著家庭結構的轉變，到後來則只剩下老夫老妻的核心家庭；其二，生產技術的改變，使教育對所得的重要性逐漸凌駕工作經驗之上。因此一個教育程度較低但是工作經驗較豐富的老年人，其所得漸漸不敵一個工作經驗較少但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年輕人）。一般的印象，覺得老年家庭是經濟上的弱者，且其地位每況愈下，根據的就是其家庭所得。

如果觀察每組家庭的相對 IAE，情形就完全不一樣。首先，歷年來單峰的倒 U 型分配被雙峰分配取代。30 歲及 50 歲組家庭，從頭至尾都享受到高於平均水準的經濟福利。1990 年之前，壯年家庭中 40 歲組家庭不是富者，反而是貧者，他們享有的經濟福利常常少於老年家庭及年輕家庭。至於 50 歲組家庭雖然是最富者，但其經濟福利仍常低於 30 歲組家庭。壯年家庭（40 歲及 50 歲組）的相對 IAE 一直小於相對所得，表示他們的所得雖然最高，但由於消費單位也最多，因此享受的經濟福利反而不如 30 歲組的家庭。其中 40 歲組的所得本來就少於 50 歲組，再經眾多消費成員瓜分，其經濟福利在 1990 年之前甚至低於一般平均水準。在 1985 年之前，40 歲組家庭的經濟福利是各類家庭中最低的。1985 年之後漸有改善，及至 1990 年總算趕上一般平均水準。

30 歲及 60 歲組家庭的相對 IAE 一直大於相對所得，表示他們的所得雖然不高，但由於消費成員也最少，因此享受的經濟福利反而不比所得所表現的少。20 歲組家庭的相對 IAE 在 1985 年之前也大於其相對所得，之後則略低。

表 4 各組家庭的相對所得和(相對 IAE)：以戶長年齡分

年度	29—	30—39	40—49	50—59	60+
1976	91.89 (102.40)	96.37 (102.29)	103.08 (95.09)	108.95 (102.13)	92.03 (102.74)
1980	94.02 (101.81)	98.71 (104.52)	102.24 (91.78)	108.46 (103.08)	83.84 (96.78)
1985	92.52 (93.20)	100.16 (104.47)	104.48 (94.47)	110.29 (104.14)	76.97 (98.92)
1990	98.10 (97.83)	100.31 (103.81)	109.33 (100.26)	111.50 (100.79)	67.05 (88.41)
1995	94.71 (92.32)	102.81 (104.39)	108.96 (101.58)	116.54 (106.49)	62.76 (85.50)

圖 3-1 至 3-5 描繪了表 4 的內容，不但有助我們對上一段文字的瞭解，而且也可看出各類家庭相對所得及相對經濟福利的長期趨勢。根據圖 3 我們發現：年輕家庭和老年家庭確是經濟上的弱者，他們的所得和經濟福利從 1980 年之後都低於平均水準。(縱座標 100 的水平線表示平均水準)老年家庭的情況尤其是每況愈下，所幸他們享受的經濟福利一直都高於所得水準。

圖 3-1 20 歲家庭相對所得及相對經濟福利的長期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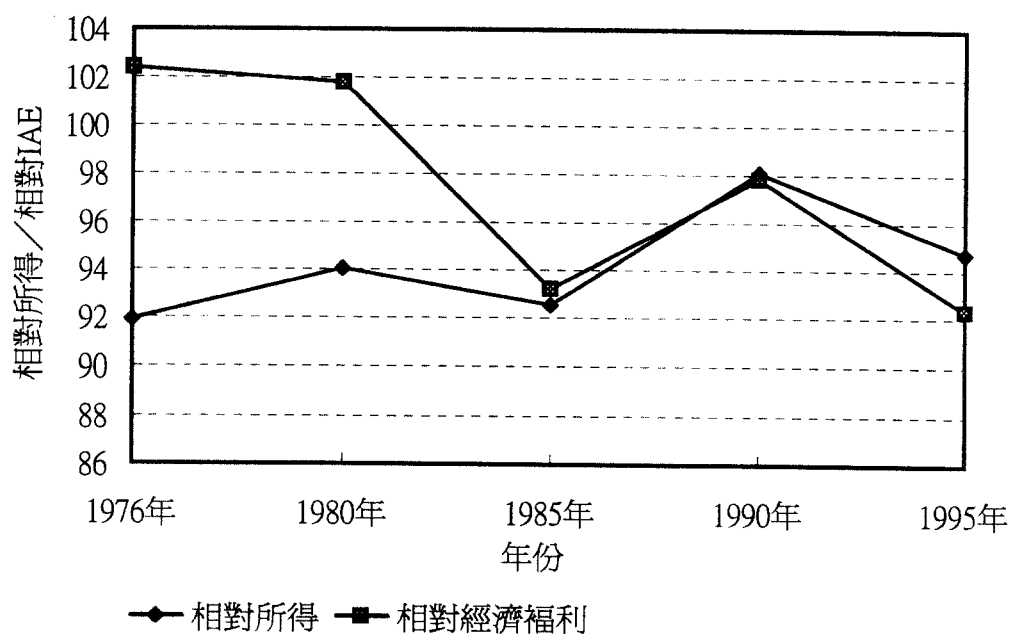


圖 3-2 30 歲家庭相對所得及相對經濟福利的長期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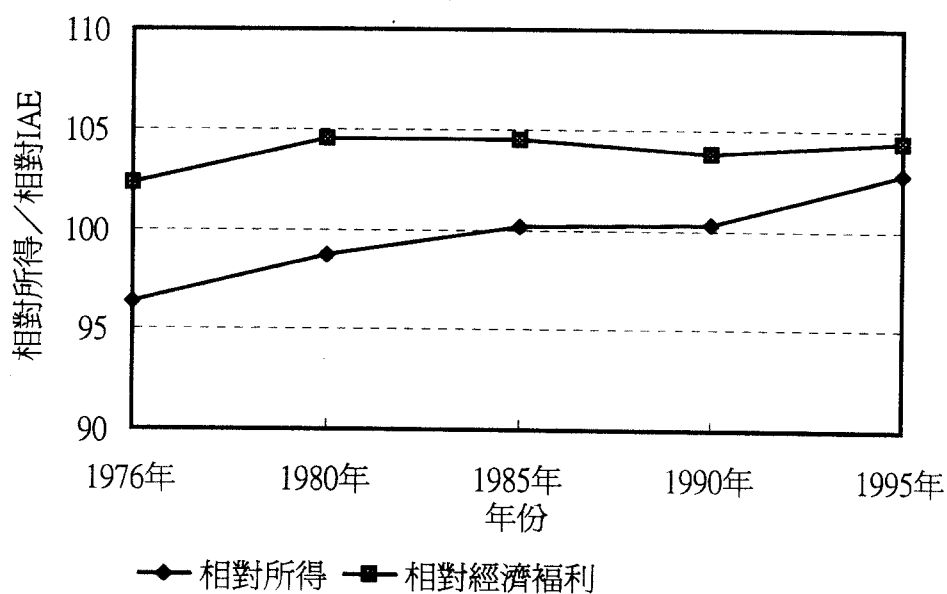


圖 3-3 40 歲家庭相對所得及相對經濟福利的長期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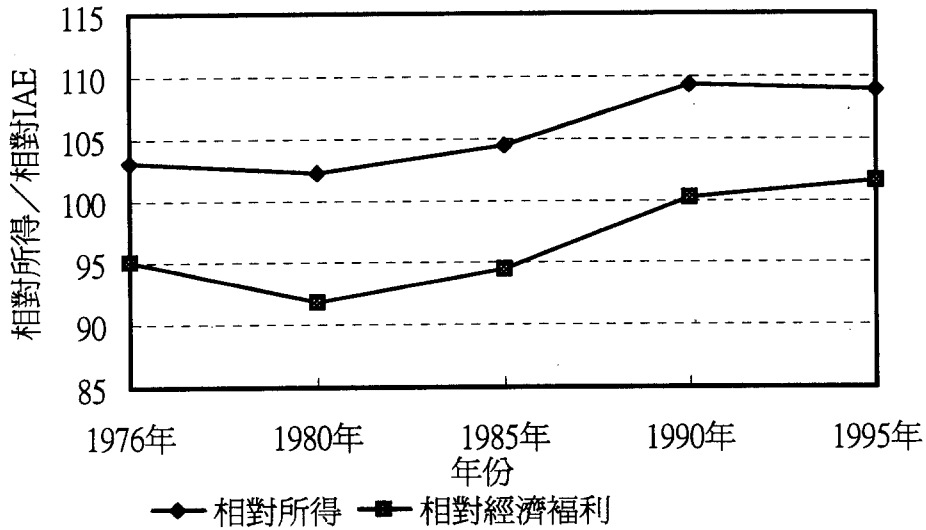


圖 3-4 50 歲家庭相對所得及相對經濟福利的長期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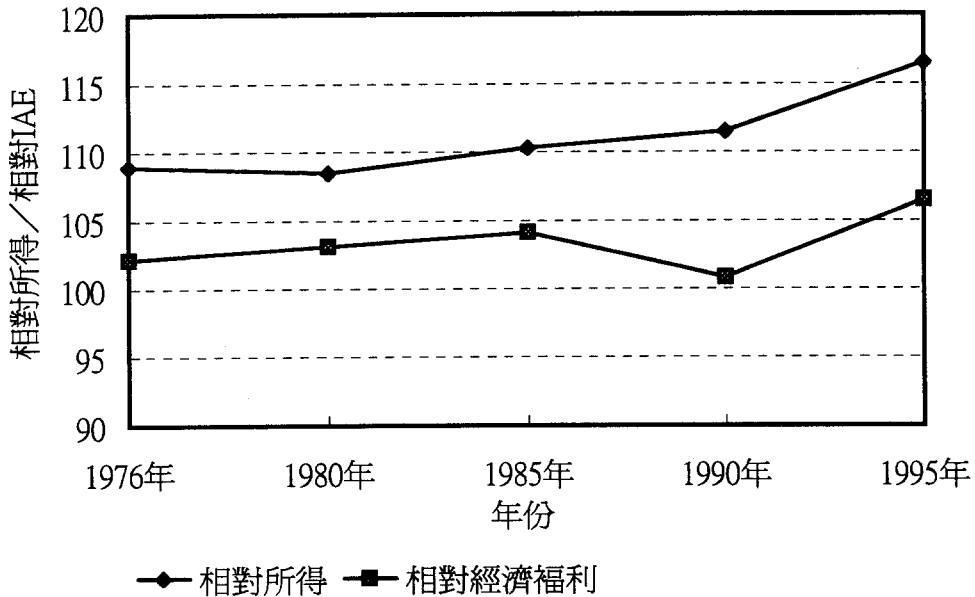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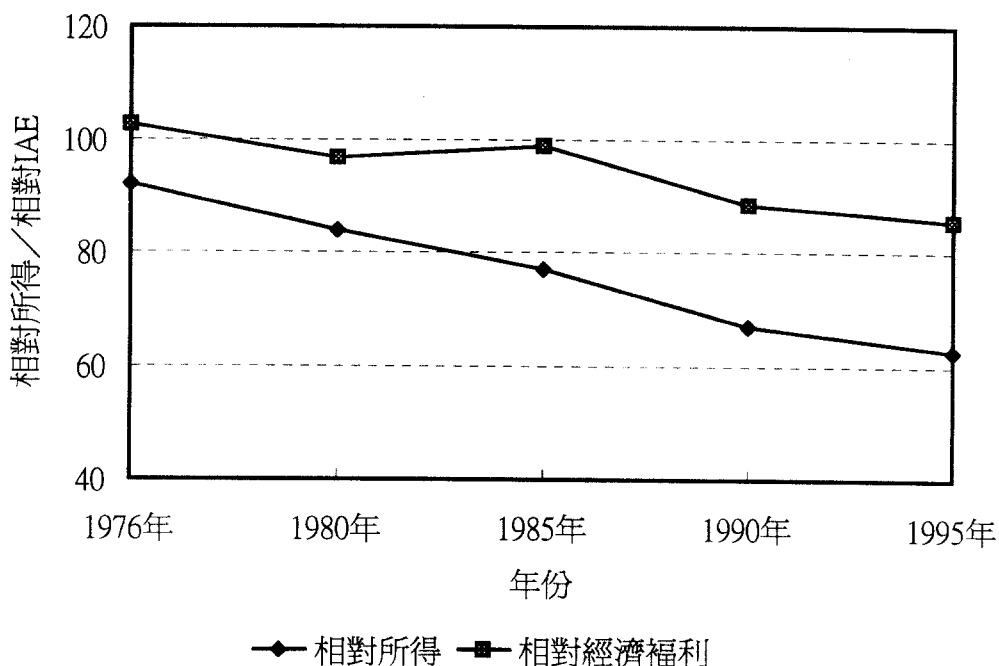


圖 3-5 60 歲家庭相對所得及相對經濟福利的長期趨勢



陸、結論

本文運用行政院主計處 1976 年至 1995 年的家庭所得分配調查報告資料，探討家庭結構變化，如何影響各類家庭的所得及經濟福利的水準及其分配。以下我們列舉幾項重要的發現：

1. 如果把所有的家庭按照就業者的人數分組，則就業者愈多的家庭其所得分配愈平均。另外，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就業者的家庭，其所得不均度一直低於全體的不均度，而且它的長期趨勢是遞減而不是遞增。但是只有單一就業者（含無就業者）的家庭之間，其所得不均度則從 1980 年起持續上升，顯然整體家庭所得不均度的上升，除了肇因於各組家庭的「組間貢獻」之外，最主要就是來自單一及無就業者家庭這一組的「組內貢獻」。
2. 由於家庭結構的變化和婦女就業率的提升，擁有單一就業者（含無就業者）的家庭，漸漸形成低學歷、高年紀的老年家庭的代名詞。（請參見第四節）。

另外，相對來說，他們居住於鄉村和從事農業活動的比率也比較高。這似乎解釋了何以當其他家庭的所得不均度都在下降時，他們竟反其道而行，並且抵銷其他家庭的影響，從而帶動全體家庭的不均度往上升。

3. 家庭內的人力資本對所得不均度之重要性與日俱增的現象，不僅發生在全體家庭之間，也發生在單一就業者（含無就業者）家庭之間。在 1995 年，單一就業者（含無就業者）家庭所得不均度中，超過四分之一可被家長的年齡、教育解釋。
4. 家庭的經濟福利一方面取決於該家庭的總所得，另一方面取決於共同消費該所得的人口組合。由於消費單位較少，貧戶及老年家庭享有的經濟福利常比其家庭所得顯示的還高。富戶和壯年家庭的的情況正好相反。因此近年來家庭間經濟福利的不均度雖亦愈來愈大，但卻遠小於所得的不均度。
5. 就經濟福利分配來說，就業者愈多的家庭其分配不見得愈平均。兩個就業者家庭的不均度就大於單一就業者家庭的不均度，表示前類家庭的消費單位差異極大，掩蓋了該組家庭所得比較平均的事實。可見影響經濟福利分配和所得分配的因素很不一樣。
6. 如果把所有家庭按家長年齡分組，歷年來 50 歲組家庭的所得水準總是最高，其次為 40 歲組，年輕家庭及老年家庭所得最低，是倒 U 型分配的兩端尾巴。這印證了傳統人力資本理論（human capital theory）的推論。如果觀察每組家庭的經濟福利水準，情形就完全不一樣。首先，歷年來單峰的倒 U 型分配被雙峰分配取代。30 歲及 50 歲組家庭，從頭至尾都享受到高於平均水準的經濟福利。1990 年之前，壯年家庭中 40 歲組家庭不是富者，反而是貧者，他們享有的經濟福利常常少於老年家庭及年輕家庭。可見所得水準和經濟福利水準是類似但不相同的概念。

近年來社會福利政策常成為熱門話題，本文的分析可為政府擬定政策的參考。不過，本文第五節的分析結果與 IAE 的定義中，等成人數的計算方法有關。誠如王金利（1988）所言：應用等成年數時，因測定方法的不同，差異可能很大，這是後續研究值得嘗試的方向。

最後，家庭結構以及家庭成員的就業狀況在本研究中皆屬外生變數，本文並未探討它們是如何決定的，其實這兩者應該都是家庭成員集體理性思考

的結果。可行的方向是從家庭總效用函數出發，家庭成員一方面決定家庭結構，另一方面決定各成員是否就業，透過上述兩項決定追求家庭總效用函數的極大值。家庭總效用不只與家庭總所得有關，也取決於休閒、子女教育成果、成員間的關係及隱私等等。換言之，理論上我們需要一個可以同時解釋家庭結構以及各成員勞動供給的模型；實證上，目前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庫仍然無法支持此一研究。這些都有待後續的努力。

參考資料

王金利

- 1989 〈等成年男子數折算標準之比較檢討〉，中興大學《經濟研究》29:81-101。

朱雲鵬

- 1989 〈1980 年至 86 年間台灣所得分配變動趨勢的分析〉，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叢刊選刊》25:437-475。

朱雲鵬

- 1991 〈家戶大小和所得分配：1980 與 1989 年台灣實證研究〉，中國經濟學會《年會論文集》，第 287-308 頁。

林金源

- 1995 〈家庭結構變化對台灣所得分配的影響〉，台灣經濟學會《年會論文集》，第 161-178 頁。

曹添旺

- 1996 〈台灣家庭所得不均度的分解與變化試析，1980-1993〉，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8(2):181-220。

饒志堅等

- 1991 〈個人所得分配差距變動原因之研究〉，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統計專題報告 80-12》。

Chu, C. Y. Cyrus and Lily Jiang

- 1997 "Demographic Transition, Family Structure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of Taiwa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forthcoming.

Cowell, F. A.

- 1988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Three Bad Measures," *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 40(4):309-312.

Deaton, Angus and C. H. Paxson

- 1993 "Inequality and Aging: 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Prepared for the Economic Modeling Bureau of Australia'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Cairns, Australia.]

Fuchs, Victor

- 1986 "Sex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Well-being," *Science* 232 (April):459-464.

Easterlin, R. A., C. MacDonald and D. J. Macunovich

- 1990 "How Have American Baby Boomers Fared? Earnings and Economic Well-being of Young Adults, 1964-1987,"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3: 277-290.

Kuznets, Simon

- 1980 "Notes o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aiwan," in L. R. Klein, M. Nerlove & S. C. Tsiang (ed), *Quantitative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255-80.

Lin, Ching-Yuan

- 1994 "Changing Role of the Household as an Income Equalizer: an Empirical Study

of Kuznets Hypothesis on the Case of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npublished).

Santi, Lawrence L.

- 1988 "The Demographic Context of Recent Change in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Households," *Demography* 25(4):509-519.

Shorrocks, A. F.

- 1980 "The Class of Additively Decomposable Inequality," *Econometrica* 48(3):613-625.
- 1984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by Population Subgroups," *Econometrica* 52(6):1369-1385.

The Effects of Household Compositional Changes on the Distributions of Income and Economic Well-being in Taiwan

Ching-yuan Li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is a follow-up of Lin (1994) and Lin (1995), which assert that the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Taiwan since 1980 can be mainly attributed to changes in household composition. I find that aggregate income inequality was driven up by households with zero to one income-earners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heads of such households are getting older and less educated. Such households are, furthermore, concentrated in rural areas participating i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I also find that the levels and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well-being, measured by income per adult equivalent (IAE), differ from those of household income. Specially, the level of economic well-being enjoyed by rich households is not as high as their level of income, which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such households usually possess more adult equivalents. The converse is true for the poor households in the study.

Key Words: income inequality, economic well-being, income per adult equivalent (IAE), household composition